

DOI:10.19329/j.cnki.1673-2928.2023.03.007

# 来华犹太移民的历史记忆：两种文明的交往

高元<sup>1,2</sup>

(1.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郑州 450046; 2. 郑州大学, 郑州 450000)

**摘要:** 中国古代历史上较早出现了犹太人, 该族群在此后的数百年时间里经历了发展壮大、逐步同化和数次迁徙。犹太文化与中华文化经过长期交流与融合, 既有融会贯通之处, 也有犹太民族在移居中国后民族特性世代相传之处。犹太移民在中国能够长期和睦共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映射, 亦对全世界向往和平和谐与正义的人民有所启示。

**关键词:** 犹太移民; 民族融合; 文明互鉴

**中图分类号:** K25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2928(2023)03-0028-05

当利玛窦在17世纪初发现中国犹太人时, 便发现他们家里虽然还保留着一些希伯来文经卷, 但已不能认读<sup>[1][57]</sup>。长期研究开封犹太人的加拿大中华圣公会河南教区主教怀履光指出, 到19世纪中叶, “无论从宗教意义或作为一个社团来说, (开封) 犹太人已不复存在”<sup>[2]</sup>。在社会生活中似乎“不成问题”的“中国犹太人”实际上为研究者提出了颇具挑战性的问题——为什么犹太人群体能够在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家长期生存、和睦共处? 为什么犹太人的外在显性特质在中国逐渐模糊?

我国学者对于犹太人问题较为详细的研究始于叶瀚、陈垣等学者。陈垣于1920年发表《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对于开封犹太人遗存的碑刻作出了详细的考证, 并梳理了犹太教与回教的异同、挑筋教名称的由来、可考的中国犹太教人物、寺庙发展、经书源流等问题, 为来华犹太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徐宗泽等学者也对犹太人来华的时间和路线、开封犹太社团的形成、相关史料的翻译考订有所贡献。20世纪80年代以来, 在华犹太人再度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 这一时期对西文史料及西方史学研究的借鉴更加充分, 学者切入的视角有所扩展, 犹太人的同化问题、二战时期的上海犹太人问题都被纳入讨论, 出现了《关于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上海犹太人》等著作。

目前学界关于犹太人同化原因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对开封犹太人社团上, 并分化出了五种观点<sup>[3]</sup>: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当时的封闭环境导

致犹太社团失去与国外的联系, 缺乏新鲜血液; 第二种观点侧重通婚导致民族融合, 使犹太人汉化; 第三种观点认为科举制将犹太知识分子、犹太人儒化, 并最终被本土化;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宽松的宗教自由政策和文化环境(主要包括相似的道德传统和伦理观)使得犹太人在心理上更容易产生对国家的认同; 第五种观点提出阶级分化是开封犹太人衰落的原因之一, 贫富之别使得族内的向心力被不断减弱。

本文将结合现有史料和研究成果, 在梳理犹太人来华史的基础上, 对犹太人在中国的生存状况以及其与中华民族融合等问题提出新的思考, 希望能够对相关问题的探讨有所贡献。

## 1 古代来华犹太人及其生存状态

根据目前确切可考的史料, 中国古代即有犹太人来华, 宋至明清间犹太人亦曾在开封、扬州等地形成较大的聚居族群。

犹太人最早来到中国的时间是具有一定争议性的问题。开封存有 blocks 犹太人记载历史的碑文, 然而其说法不一——“据弘治碑则言来自宋, 据正德碑则言来自汉, 据康熙碑则言来自周”<sup>[4]</sup>。弘治碑尚难以追溯宋以前的历史, 那么之后两块碑文的可信性更值得怀疑。除了针对碑文进行分析并佐以其他文字材料外, 实物材料亦能帮助比对文字真伪。1901年英籍冒险家斯坦因在我国新疆于阗的丹丹乌里克发现了一封犹太—波斯语书信, 经考证该信件由身处丹丹乌里克的犹太商人写给塔巴里斯坦的雇主, 成文时间上应属唐代, 也成为迄今所知犹太人入华贸易的最早历史记载<sup>[5]</sup>; 不

**收稿日期:** 2023-02-26

**基金项目:** 2022年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以色列中国学与中文教育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22YH13D)资助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高元(1989—), 女, 河南滑县人,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讲师,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犹太—中东史。

久之后的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从敦煌取走的一件希伯来语忏悔祈祷文，内容取自《旧约·诗篇》，书写时间大约在6—8世纪<sup>[6]</sup>。如果再考虑到此时造纸术尚未推广到阿拉伯，那么这些信件显然是由移居中国的犹太人书写。从以上两件文物可以推定，最迟在8世纪初已有犹太人来到中国。犹太人将本民族的文化传入中国时，中华文明与犹太文明也开始了互动。目前学术界普遍公认的观点即是在唐代（约8世纪前后）出现了大批犹太人沿着丝绸之路来华，上面所提及的两项考古发现也充分佐证了这一看法。

据明弘治年间碑文记载：“出自天竺，奉命而来。由李、俺、艾、高、穆、赵、金、周、张、石、黄、李、聂、金、张、左、白，七十姓，进贡西洋布于宋。帝曰：‘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sup>[12]21</sup>及北宋时期，一批犹太人随着阿拉伯人、突厥人、波斯人等中西亚游牧民族经丝绸之路来到了当时的都城东京（今开封，以下统称开封）。

从现有史料来看，移居开封的犹太人受到了宋朝政府的友好接待，他们被允准归依中国，可保持本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并定居在开封。此后，他们在居住、迁徙、谋业、就学、土地买卖、宗教信仰、通婚等诸方面均享受与汉族同样的权利和待遇<sup>[7]</sup>。由于政策环境的宽松友好，犹太人开始了他们的经商致富生活，逐渐跻身于开封及周边地区的富裕阶层。与经商一同兴旺的，是犹太民族的宗教活动，一赐乐业教清真寺便是他们宗教活动的标志<sup>[8]</sup>。“一赐乐业”即Israel的译音，由当地的犹太人于1163年建成。据陈垣考证，由于汉人当时无法区分犹太教与回教之间的差异，便使用了这一称呼。1279年，当地犹太人得到了元朝政府的支持，重建会堂，面积达 $10 \times 10^3 \text{m}^2$ 之多。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述，元世祖忽必烈推崇佛教的释迦牟尼、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基督教的耶稣和一赐乐业教的摩西为世界“四大先知”<sup>[9]</sup>。由此可见，当时的犹太教在中国并没有受到歧视或者差别对待，而是得到了很好的尊重且受到统治者的认可。

明朝时期，开封犹太移民已有500多户家庭，人口达到了5000人左右，还不包括迁徙到中国其他地区的开封犹太人及其后裔。开封犹太人的日益发展强盛不仅仅体现在人员增长上，也体现在同一时期开封犹太人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上。据开封犹太人所遗之《尊崇道经寺记》碑（作于明正德七年）记载，这一时期开封犹太人有通过参加科举进入仕途的，有通过从事商业活动而成为富豪的，有身怀高超技艺的工匠，也有勤恳

播种的农民。“求观今日，若进取科目，而显亲扬名者有之。若布列中外，而致君泽民者有之。或折冲御侮，而尽忠报国者有之。或德修厥功，而善著于一乡者亦有之。逮夫农耕于野，而公税以给。工精于艺，而公用不乏。商勤于远，而名著于江湖。贾志于守，而获利于通方者，又有之矣。”<sup>[12]19</sup>碑文的列举严格按照“士农工商”的顺序，大概并非巧合，而是接受了中国传统社会对职业的认知，虽然措辞不免有夸张和修饰的可能，但可以推测这时的犹太人已经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有所活动，由科举进入官僚队伍更是引人注目的新现象。

崇祯末年，战乱不断，开封城内的犹太人数从4000多人骤减至2000人左右，犹太会堂坍塌，大量经书典籍散失。虽然留居开封城的犹太人在1663年重建犹太会堂，并找回部分经书。但此时开封犹太人已从弘治碑中所称最初定居东京时的七十姓（家族）减少到“七姓八家”，即“李赵艾张高金石”七个家族，可说是元气大伤<sup>[12]19</sup>。此后两百年，开封犹太社团再未能恢复昔日的荣光，逐渐没落。

开封犹太族群的逐渐衰落，从宏观上说与所居地的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开封犹太人的衰落伴随着开封城的衰落。虽然在宋朝时开封曾是国都之选，直至元、明时期也是比较发达繁荣的城市，然而在清朝时，开封城却荣光不再，到了晚清时期，人口数仅十余万，论其规模也只是一个中等城市了<sup>[10]</sup>。城市的衰落自然导致了城内人员的发展受限，包括开封犹太人在内的许多有才干的人都离开开封另谋出路，而留下来的大抵是老弱妇孺或者是一些没有太高文化水平的体力劳动从事者<sup>[11]</sup>。开封经济发展缓慢使开封犹太人日趋贫困，逐渐衰落。在此期间，开封犹太人已无钱再修葺会堂，致使会堂日趋破旧，到19世纪中叶最终毁废。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明清以来的闭关政策使得地处中原的开封与其他国家往来十分有限。一赐乐业教的最后一位掌教（拉比）在19世纪初去世后，因无法找到新的掌教，导致专职掌教后继无人，宗教仪式就此不再举行，此后开封犹太人的宗教观念便日趋淡薄而最终消失。

## 2 近代以来犹太人来华及其聚居地的形成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同各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封闭多年的国门就此打开，这使得此后一个世纪犹太人的持续来华成为可能。

将史料进行梳理总结，可以看到，在此期间



犹太人主要有三次大规模的移民中国浪潮：

第一次是19世纪40年代以后从英属中东、南亚和东南亚来华经商办实业的塞法尔迪犹太人，持续时间十数年；第二次是19世纪末叶以后为逃避反犹浪潮以及俄国内战来华谋生的俄国犹太人，持续时间也有十几年；第三次是1933—1941年间从纳粹统治下的欧洲亡命来华的犹太人。

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后，清朝国门大开，中东、南亚等地区的塞法尔迪犹太人在拓展商业利益的驱动下陆续来到中国。这一时期来华的犹太人拥有英国国籍，主要在香港、上海等通商口岸居住，来华以后这些犹太人形成了大约有一两千人的犹太族群。他们当中有的人从事经商活动，有的则充当同乡的雇员，许多富商就出现在这些人当中，例如沙逊、哈同、嘉道理等，他们都在中国留下过辉煌的商业足迹。如今伫立于上海外滩的和平饭店就是当年沙逊洋行的旧址（沙逊洋行曾经是远东第一洋行）。这些犹太家族对当时中国乃至远东的经济生活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国内反犹主义盛行，内战连年不断，俄国的阿什肯纳兹（中、东欧）犹太人为躲避战乱，选择来到内蒙古、东北等地，并在哈尔滨和天津形成了两个较大的犹太人聚居区。同时在满洲里、海拉尔、齐齐哈尔、沈阳、大连、青岛等地也有犹太人的聚居地<sup>[12]</sup>。日本侵占东三省后，当地的犹太人大批南下，天津、上海接纳的犹太人数量剧增，一部分犹太人选择了到北京、香港等地定居。同第一次来华的犹太人不同的是，俄国犹太人来中国时均以难民的身份进入，几乎都是一贫如洗。一位俄国犹太人回忆道：“从事较好职业的人能够负担在上海较富裕地区的生活费用，但大多数身无分文的犹太人只能在虹口——该城最贫困地区之一居住。”<sup>[13]</sup>

1933—1941年之间，有近3万欧洲犹太难民从纳粹屠刀下辗转逃生来到上海。上海是当时世界上唯一向犹太人敞开大门、无需护照签证和担保就可进入的大都市。“无国籍之犹太人之情形特殊，我国素重人道，先总理亦常以人类大同主义训诲同志，吾人理应尽力之所能，予以协助”<sup>[14]</sup>。凡此种种，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济人于危难的仁义精神。

### 3 文明互鉴视角下来华犹太移民的民族性保持与融合

犹太民族有本民族的习俗和宗教信仰，本不易融合于其他民族之中，也不太容易被其他民族

所接纳。但是，古代犹太人来华之后，不但顺利地被汉民族接纳，而且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之后，逐渐融合于中华民族之中，失去了其原有的民族特征。而近现代的犹太人来华之后，虽然也很快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接纳，但依然保持其犹太民族固有的习俗和宗教信仰，并且很快就转徙他处，其原因值得探析。

#### 3.1 古代犹太人移民群体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原因

古代犹太人来华最终融入中华民族，与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密切相关，这与欧洲社会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自古以来，中国都是以天下为重，以天子为中心，以思想文化作为统治的凝聚力，重视五方之民的道德教化，“宣德化而柔远人”，从而建立起认知和统治世界的知识与道德谱系。这样的“天下观”使得中国具有包容异族，接纳其生产方式、习俗和宗教文化的传统。《周礼·王制·第五》说：“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sup>[15]</sup>（这里的“中国”是指中原地区）从中可以看出中华文化对异于自身的民族与文化持有尊重与保留的态度。自古以来，中国历朝历代都是以中原地区的华夏文明为中心，在异族异教不威胁其统治的前提下，秉持“天下一家”的理念，对于各个地区的民族，采取包容的态度，对其文化也是进行保护与学习，彼此影响，相互借鉴<sup>[16]</sup>。

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周边少数民族便与中原地区的华夏民族一起居住。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相继南迁，进一步加深了与黄河流域汉族的融合。受到当时汉族先进生产技术、文艺风俗以及语言文字的影响熏陶，这些民族开始学习汉族的语言，穿着汉族的服饰，甚至改为汉族姓氏，及至唐朝，大部分民族已经被汉族同化，抹去了自己的民族特点。五代之后，一些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统一的政权，有的甚至入主中原，民族之间的流动迁徙相比之前更为频繁，民族融合进一步加深。因此，华夏民族是由多民族的血液融汇而成。

中世纪的欧洲，教会有着相当高的权力，从8世纪开始，教皇的权势从某些方面来说已经超越了国王，教权凌驾于君权之上。基督教在当时的思想和文化领域中占据着绝对的地位，成为普遍的世界观渗透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即便是后来教会衰落，君权居于上风，基督教在社会成员的生活以及思想方面的影响依旧广泛。而在古代中国，向来是君权至上，没有任何势力可以动摇

这一观念，也就不存在可以与政府并驾齐驱甚至高于政府权力的宗教，自然而然也就不会因为宗教之间的冲突而对犹太民族产生憎恶。

从基督教诞生开始，欧洲的反犹主义便崭露头角。犹太教有一分支叫做撒勒派，大约在公元1世纪之时演变成为基督教。尽管基督教与犹太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耶稣的门徒在传播本教思想时，为了与犹太教争夺信徒，便开始对犹太教进行脱离分割，《圣经·新约》应运而生。《新约》中提到耶稣基督之所以会被罗马总督钉上十字架，就是被犹太人犹大出卖所致，这便埋下了基督教徒与犹太人结下宿仇的种子。反观中国，主要是受儒道佛三家文化的熏陶，这与犹太人或者犹太教并无冲突，所以从根源上中国便没有反犹主义的宗教因素，更不存在如欧洲那般弥漫着浓厚宗教色彩的反犹偏见。

其实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诸如佛教、伊斯兰教、祆教（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唐朝称景教，元朝称也里可温教）、犹太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sup>[17]</sup>。由于这些宗教没有成为儒家思想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就对封建政权的统治无法形成冲击，因此这些宗教传入中国后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派和谐相处，相安无事，并且相互借鉴融合，使得中国文化有了更加丰富的内容与源流，生命力也更加强盛。中国文化对外来宗教文化的包容力和同化力最直观的体现便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在本土不断发展融合，最终与儒家、道家齐名，成为中国主流文化之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之一便是“和为贵”，这就可以理解为何中国会出现多民族、多宗教共同发展、和谐相处的景象。

综合以上因素，犹太民族是在逐渐吸收中华文化的过程中，部分民族性逐渐消失，最终完全融入于中华民族。

### 3.2 近代以来犹太人移居中国又转徙他处的原因

近代以来犹太人移居中国又迅速转徙他处，与战争、宗教矛盾以及世界局势变化关系密切。众所周知，基督教与犹太教的矛盾存在已久，但是长期以来却并未发生二战期间那样对犹太人大规模屠杀的事件。19世纪以来，种族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登上舞台，它其实是早期欧洲殖民者在侵犯美洲、非洲等地时，在当地土著居民面前所呈现出来的白人优越感。随着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以及西方生产力与科技的日渐成熟，白种人开始对世界其他民族产生除了自我优越感，并试图掌控其他民族，支配整个世界，以满足自身扩张的需要。种族主

义认为种族之间是存在体质与智力的差异优劣的，因此充斥着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甚至上升到种族灭绝这样近乎狂热的行为。近现代的反犹主义便是在这一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进行种族反犹。他们将犹太种族视为低等劣质的民族，认为这一族类必定会对他们自身优越的雅利安日耳曼种族血统产生玷污，清除这一种族势在必行，纳粹德国对犹太民族的血洗屠杀正是这一理论观点的体现。同样曾沦为西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sup>[18]</sup>，却从来没有被这一理论影响，从未成为种族主义的市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民族主义开始觉醒，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各个民族各个族类日益团结为一个整体对抗外来侵略者，无数仁人志士为拯救中国而日益奔走操劳。因此，中国也并不存在近代种族主义者所宣扬的所谓人种优越论、血统论。

二战结束后，由于中国内战爆发，也由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难民身份移居中国的大多数犹太人陆续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犹太等地寻找亲眷，少数犹太人返回欧洲。此后，中国大陆境内的几大聚居区犹太人逐渐减少。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外部环境的变化是近代犹太移民没有像古代犹太移民一样长期定居中国的主要原因。

犹太民族具有鲜明的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在民族迁徙过程中，普遍保持本民族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但由于汉民族文化极具多元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历史上的犹太移民在中国长期生存发展过程中不断与汉民族相融合，部分民族特征逐渐消失，又因为所居地区经济发展衰落，也使这一地区的犹太族群整体衰落下去，并最终融入汉民族之中。近代以来的犹太人移居中国，由于生活时间较短，对外联络相对便捷等原因，民族特性并未做出显著改变。

### 参考文献：

- [1] 江文汉. 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景教、元朝的也里可温、中国的犹太人[M]. 北京：知识出版社，1982.
- [2] 龚方震. 丝绸之路上的犹太商人[M]// 朱威烈，金应忠. 中国犹太学研究总汇. 北京：三联书店，1992：21.
- [3] 张倩红，贾森. 丝绸之路视域下的犹太商人：开封犹太社团来历问题研究述评[J]. 国际汉学，2015（3）：53.
- [4] 陈垣. 开封一赐乐业教考[C]// 陈垣学术论文集. 北京：中华书局，1980：259.
- [5] 李大伟. 丹丹乌里克犹太：波斯文信件考释[J]. 敦煌研究，2016（1）：89.

- [6] P M. Mandarins, Jews, and missionaries: The Jewish experience in the Chinese Empire[M]. Philadelphia, 1980: 260.
- [7] 陈贻绎. 中国古代开封犹太人被同化现象初探[J]. 世界宗教研究, 1994(1): 36.
- [8] 徐亦亭. 开封犹太人和中国古代民族文化[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1994(3): 43.
- [9] 魏千志. 中国犹太人定居开封时间考[J]. 史学月刊, 1993(5): 53.
- [10] 开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开封市志 综合册[M]. 北京: 燕山出版社, 2004: 372-373.
- [11] 潘光. 犹太人与中国[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0: 43.
- [12] 房建昌.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各地犹太人概貌[J]. 近代史研究, 1997(6): 50.
- [13] 亚伯拉罕·弗拉德金. 一个俄国犹太人在上海[M]// 犹太人忆上海.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78辑.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上海犹太研究中心, 1995: 57.
- [14]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外慈善团体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史料(一)[J]. 民国档案, 1998(4): 9.
- [15] 石竞琳. 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没有反犹主义[J]. 世界民族, 2016(1): 82.
- [16] 侯灿. 丝绸之路学的涵义, 内容及其方法[J]. 丝绸之路, 1997(6): 53.
- [17] 黄陵渝. 犹太教研究在中国[J]. 世界宗教研究, 1999(3): 63.
- [18] 张宏儒. 二十世纪世界各国大事全书[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5: 118.

##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Jewish Immigrants in China: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wo Civilizations

GAO Kang<sup>1,2</sup>

(1. North China University,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Zhengzhou 450046, China; 2.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0, China)

**Abstract:** The arrival of Jews appeared early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and this ethnic group has experienced growth and gradual assimilation in the following hundreds of years. After many exchanges and fusions between Jewish culture and Chinese culture, there are not only places where they are integrated, but also places where the Jewish people's national identity has been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after they immigrated to China. The long-term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Jewish immigrants in China reflects the idea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it has also enlightened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who yearn for peace, harmony and justice.

**Key words:** Jewish immigrants; culture integration; mutual learning

(责任编辑: 陈丽娟)